

从国家观出发看西藏历史

孙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同时，他还强调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高屋建瓴地揭示了西藏历史是祖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藏地方的必然归属

中央历次的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强调，做好西藏工作事关全党全国的大局。在全国加强“五个认同”的教育和引导，边疆地区如此，西藏和涉藏相关地方也是如此。做好西藏和涉藏相关地方的工作，以“五个认同”统一思想观念，首先要解决国家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和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相关，尤其是和历史观密切相关。

历史观对国家观而言，在于从观念上引申出历史方位的视野。历史方位，简单地讲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有维度的坐标，每一个时段是其他时段的接续，每一个空间和其他空间都有关联，每个民族、国家和个人都处在一个位置上，都有一定的意义。近些年中央的相关文献，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都有着精辟的判定和论述。

我们国家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什么？概括地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废除封建制度、推翻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革命和建设，遭受风雨坎坷，又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逐渐富足，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是很不容易的。

从近处说，走到今天这一历史方位，是上百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往远一点说，是上千年来中国各个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依共存，其中也包括血与火的交往，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能分离、不可分割的关系，缔造了统一的国家所带来的。再往远

处说，是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族群，经过自在到自觉的意识而形成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推动建立和发展祖国的历程所奠定的。国家认同在中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它是连续的、连贯的，从未断裂过。

站在大历史的方位上看，涉及西藏工作的国家观，其核心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不仅是国务院新闻办近年来在涉藏白皮书中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陈述，也是在涉藏工作之中需要理解和认清的史实。

一个国家从萌芽到形成，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的，是“动态”的，是先有其实，后得其名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有其“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西藏今天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也有其“长期的合理性”。

西方文明的进程有西方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衡量所有文明进程的合理与否，西方国家的形成有西方国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衡量所有国家形成的合理与否。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个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在于中国各兄弟民族经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正如毛泽东早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因此，作为统一国家各组成部分的历史进程，以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形式，构成了中国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史，西藏历史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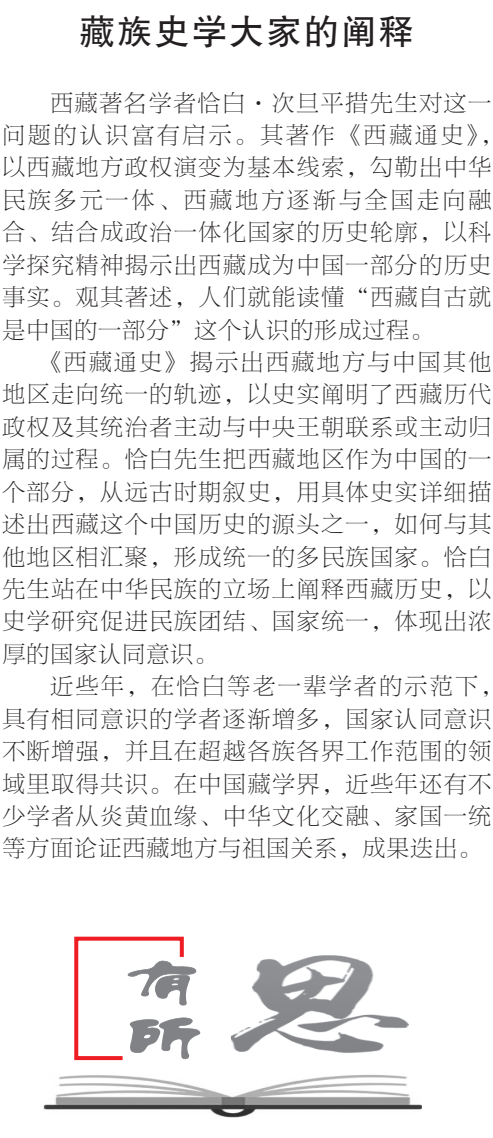
大量的史料表明，藏族在由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历史进程之始，如同中国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就自觉地参与到了缔造统一中国的历程，并在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之后，为统一的中国作出了持续的贡献。由此可以说，理解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今天在涉藏工作上理解国家认同的一把钥匙。

藏族史学大家的阐释

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富有启示。其著作《西藏通史》，以西藏地方政权演变为基本线索，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西藏地方逐渐与全国走向融合、结合成政治一体化国家的历史轮廓，以科学探究精神揭示出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观其著述，人们就能读懂“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认识的形成过程。

《西藏通史》揭示出西藏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区走向统一的轨迹，以史实阐明了西藏历代政权及其统治者主动与中央王朝联系或主动归属的过程。恰白先生把西藏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从远古时期叙史，用具体史实详细描述出西藏这个中国历史的源头之一，如何与其他地区相汇聚，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恰白先生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阐释西藏历史，以史学研究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体现出浓厚的国家认同意识。

近些年，在恰白等老一辈学者的示范下，具有相同意识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并且在超越各族各界工作范围的领域里取得共识。在中国藏学界，近些年还有不少学者从炎黄血脉、中华文化交融、家国一统等方面论证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成果迭出。



作为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两大文明中心，中国和古希腊相隔千山万水。古希腊人对于中国认识模糊，以“赛里斯”（Seres）指中国北部地区，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对于遥远的赛里斯，古希腊人充满了好奇。几位希腊作家和学者的作品，记载了关于遥远的中国的状况。由于多系传闻，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混沌不清的，带有想象成分。

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远东的最早记录，当属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提斯（Aristeas）的诗作《独目人》里的记载，惜已佚失，只有片段保存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等作品中。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阿里斯提斯将这块遥远大陆上的人民称为“北风以外的人”。

有人认为，古代欧洲人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是由希腊文 Σηρ (Ser, “赛尔”) 演变而来，而“赛尔”就是丝绸、蚕茧等意，因而将“赛里斯”称为“丝国”。古希腊人没有见过赛里斯的蚕丝生产过程，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等将它想象为“长在树上的白毛”。这种想象是欧洲人对赛里斯丝绸为树上白毛的传说的开始，并在后来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里多次出现。

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代中国正值强盛时期，欧洲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知道了东方的赛里斯。到公元前1世纪，随着东西方陆上和海上联系的加强，欧洲关于中国的信息增多。公元1世纪中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欧洲人知道了东方存在着一个大国“秦奈”（Thinae），误以为它是和赛里斯不同的国家。记载“秦奈”最早的现存文献，是公元1世纪80年代佚名作者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它记载了从印度到秦奈的贸易路线。“过金国，大海北抵秦奈。其国有大城，亦名秦奈。生丝、丝线和丝料自彼输出，经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运至婆卢羯车，或经恒河运至利穆里。”

在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当属托勒密（Ptolemy，公元70—130年）的《地理志》。托勒密对世界地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关于赛里斯，托勒密写道：“赛里斯四周为群山环绕……从石塔（可能今塔什库干）到赛里斯的都城赛拉（Sera，指洛阳）的路程要经过七个月……必须在途中多次停留。”托勒密还分不清赛里斯和秦奈：“大体上我们人类所

约翰·拉贝与中国

刘晓川

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少年时代，父亲不幸去世，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拉贝一方面要为母亲分忧，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两个妹妹。踏入社会之后，拉贝不仅工作努力，而且学习刻苦，他先后自学了英语和法语，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文献，勤于写作。

拉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09年。当时受公司派遣，拉贝来到北京的一家德国公司做销售工作。之后，拉贝就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这里，拉贝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得到了公司负责人罗伊特的高度肯定，并赞誉他是处理商业事务的“一流专家”。一战爆发后，由于中德关系恶化，1919年拉贝带着妻子和孩子踏上了返德之路。

1920年，伴随着中德关系的缓和，拉贝接到了西门子公司关于派他返回中国继续开展业务的通知。同年6月，拉贝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1925年，拉贝由北京转赴天津，并出任西门子公司天津办事处负责人。

1931年，受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弗理德伦德尔之邀，拉贝转到南京工作。南京的工作和生活使拉贝对南京逐渐产生了感情，并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古老而又蕴含现代气息的城市。他曾回忆说：“南京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此期间她曾遭受过无数次的严重破坏，但在我银婚纪念日这一天却是风平浪静。”“南京到南方和北方各大城市的航空交通已上了正常轨道；新修建的街道下面还铺设了现代化的下水管道。所有这一切进行得都那么迅速。”

1937年，随着卢沟桥枪炮声的响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9月，拉贝收到了来自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来信，信件表达了他对安全的担心，并支持他采取一切对个人安全有利的措施，包括离开南京。但拉贝决意留在危在旦夕的南京城。对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遭到了严重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恶化，如何救助中国伤兵和平民，成为留守南京的中外人士关切的重要问题。鉴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在上海成功建立“南市难民区”的经验，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魏特琳等人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为了赢得各方对“南京安全区”的认可，拉贝一上任就开始忙于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高斯和法国驻上海的雅坎诺，恳请他们出面呼吁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为了安全区难民的生存，拉贝多方求援，甘愿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四处奔波疾呼，为难民乞求善款、粮食、药品及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拉贝笔耕不辍，以日记的形式详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共计2000多

高拱用人

李中军

高拱活跃于明代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在他主持下，进行了诸多重要的整顿和改革。高拱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在用人方面大胆破除积习，刷新吏治，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定了基础。

通识人才，铨考公正。高拱曾在吏部任职，深知用人不公，容易招致非议。有鉴于此，高拱嘱咐吏部各司官员在官员名册上记载每位官员多方面的情况，如官员姓氏、官爵户籍、是否贤能等，做到一月有概括、一年有汇总。如此一来，每位官员的资料较为详尽，为官员的量才授官、进退升降等提前做好准备。有了以上工作，哪怕是仓促之间选拔任用，也能做到官得其人、人得其位，而不误民误事。高拱考察官员较为全面，不是高高在上、以权压人，仅仅凭借文书资料记载就对官员进行升降，而是反复多方验证，最终综合评定。而且不论人数多寡，只要是罢黜降职的，一定告诉原因，让大家心悅诚服。

深谋远虑，储养边材。隆庆年间是明朝

中期，边境时有外敌袭扰，朝野上下对边境安全非常重视。高拱认为兵事是一门学问，如果不是日常勤加学习训练，则难以有效应对，因此储备培养兵部尚书，从兵部的官吏职员开始就要慎重。在选用这些人时，要更多地考虑一些足智多谋、富有才华并且熟谙兵事之人，一经任用，即久而任之，不得随意迁往其他岗位。同时高拱审时度势，要求增设兵部侍郎，有朝一日任命总督时，就从这些人中进行挑选。在进行培养时，由兵部侍郎外放为一地总督，又由边地总督提拔为兵部尚书，如此拾级而上，反复历练，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有阁部经历又通晓兵事，而且人才充裕，也不至于后继无人。

不拘一格，知人善任。高拱用人，既重廉能又有权变，可谓不拘一格选用人。广开用人之门，奏请将进士与举人并用，不以官员资历、出身论英雄，同时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当用其所长。广西古田（今广西永福县）民众起义，高拱知道殷正茂其人颇有非议，但仍然力排众议，坚持推荐殷正茂以

希腊作家马塞里努斯（Marcellinus）描写了礼仪之邦赛里斯：“赛里斯人为人谦和，不持兵器，永无战争。他们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洁，天空不常见雾，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英国东方学家H·裕尔在《东域纪程录丛》中进一步描写道：“赛里斯国广袤无际，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疆界。赛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性情温和，正直而简朴，不愿与邻人冲突，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丝为大宗，还有丝织品、羊毛和良铁。”

希腊化时代以来，赛里斯逐渐成为欧洲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所知的人类居住的世界最东端的民族，成为古希腊罗马文献对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指称。与赛里斯相比，主要从海上丝绸之路来了解的“秦奈”，却是一个出现比较晚的名词，而且还不多见。然而有意思的是，后来西方世界称呼中国的China或Sina，却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作家笔下鲜有使用的“秦奈”（Thinae）。

之后，欧洲人对赛里斯的描写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生活在叙利亚一带的希腊作家巴尔德撒纳（Bardesane，公元154—222年）写道：“赛里斯人的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没有寺庙，也没有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强盗，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受害者。”因为汉代中国人口众多，他还写道：“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子女。”之后，

右金都御史职务巡抚广西，负责平叛征剿，看重的就是他能征善战。殷正茂不负所托，干净利落地平定了叛乱，时人认为高拱善于用人。当时广东官员贪黷者众，为树立廉能标杆，高拱请旨破格表彰潮州知府侯必登，进而激励其他官员效仿，社会风气很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

体察下情，革除弊端。明代执行较为严格的官吏任职地区回避制度，官员大都是跨省任职，可以较好地克服和防止官吏利用亲属、地域、职务等关系以权谋私，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清明。地方府、州、县的教谕和驿递官、仓库管理者、闸坝管理员等一些杂职也参照实行跨省任职。但在现实中，这些基层官吏职位低微，俸禄稀薄，又家境贫寒，如若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跨省任职，会带来诸多不便。高拱了解情况后，果断奏请明穆宗同意，规定这些人员等不必跨省任职，可以在本省隔府人员中选用。如此一来，既沿袭了原有的地区回避制度，又有所革新，更切合实际。

希腊作家马塞里努斯（Marcellinus）描写了礼仪之邦赛里斯：“赛里斯人为人谦和，不持兵器，永无战争。他们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洁，天空不常见雾，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英国东方学家H·裕尔在《东域纪程录丛》中进一步描写道：“赛里斯国广袤无际，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疆界。赛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性情温和，正直而简朴，不愿与邻人冲突，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丝为大宗，还有丝织品、羊毛和良铁。”

希腊化时代以来，赛里斯逐渐成为欧洲通过陆路丝绸之路所知的人类居住的世界最东端的民族，成为古希腊罗马文献对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指称。与赛里斯相比，主要从海上丝绸之路来了解的“秦奈”，却是一个出现比较晚的名词，而且还不多见。然而有意思的是，后来西方世界称呼中国的China或Sina，却是来自古希腊罗马作家笔下鲜有使用的“秦奈”（Thinae）。

之后，欧洲人对赛里斯的描写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风俗礼仪。生活在叙利亚一带的希腊作家巴尔德撒纳（Bardesane，公元154—222年）写道：“赛里斯人的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没有寺庙，也没有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强盗，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受害者。”因为汉代中国人口众多，他还写道：“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子女。”之后，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